

《在克拉科夫的十日》：关于十天和一个城市的可能性

撰文_董帅

2015/12

在拿到《在克拉科夫的十日》这本书之前，心中第一个问题是这标题上的“十日”。短短十天，能发生什么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句。而初见杨圆圆不久，她就直接反问，十天太短了，能发生什么呢？这大概也是她想用整本书去回答的一个问题——十天的时间，可以与一个城市产生怎样的关联。

作为距离奥斯维辛集中营最近的城市，波兰旧都克拉科夫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。人们从世界各地涌向此地，参观战争留下的遗骸，以及一个拥有 165 年历史的盐井。杨圆圆和所有去到此地的人们身份并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是观看者，都会拍照片，写日记，购买纪念品。不同的是，这些产生自此时此刻的物件，被她通过联结的方式赋予了某种逻辑：譬如 Marina Vlady 的旧照片背后写着“1959”，那一年，战后波兰出了一系列航空纪念邮票……好多跟过去有关的时间点被揉散重组，有时松散，有时紧密。

除去对三件既存作品的引用，书中所有素材（快照，手记，老照片）都来自克拉科夫。杨圆圆形容自己的工作方式好似仓鼠，到了一个地方就开始悉悉索索地收集素材，跳蚤市场的老照片，航空博物馆，露出旧铁轨的地面，墙壁上的手印，都被她收归囊中。而押井守的《空中杀手》，卡尔维诺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，以及戈达尔的《我略知它一二》中的截图与文字节选，和来自克拉科夫的素材交织在一起，编成了一只完整的网。她说这张网她编了很久，从 2013 年底回国开始，直到 2014 年的 7 月才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版的编辑。她为最初的那版写了很多文字，关于“城市漫游者”，关于在城市中步行的体验和这个城市的关联，关于居依德波，本雅明……这些种种的理论文字一律都没有出现在最终版的书里。她说，尽管这本书关联了很多沉重的东西，“我还是希望它以一种更加轻盈的方式呈现。”。

这个去除文字的最终版本，反而呈现出了一种开放性。每一张图都没有图说，图片上的人可以是任何人。翻阅此书的感觉更像是在看一场纸上电影，页与页之间的关联就像蒙太奇。但与电影的连续流动不同的是，书籍是可跳跃，可退回的。杨圆圆用“民主”这个词形容书，书籍可被拥有，反复观看，并会一直存在于书架上。而她希望在今后的每一次展览中，都尽量会有一本书的存在。

“卡尔维诺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大致意思是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好像有一个隐形的清单在背后，如果不是看过的书，看过的电影，对他人的经验，堆砌成我们现在对这个世界的认知，那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之所以是现在的我们，不就是通过这些丝丝缕缕的东西。像《看不见的城市》这本书，很多人都看过，但是它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。它是一个去体验城市的样本，看了这个书，在不同城市你总是会有感触。到最后，这个城市是不是克拉科夫可能早已没有那么重要。”

《麓客》：先谈一谈去克拉科夫的缘由吧。

杨圆圆：其实很简单，这本书之所以做得像一个旅行笔记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最初我真的

只是单纯地作为一个游客造访这个城市。

2012 年我曾看过押井守的动画电影《空中杀手》，电影想象的是一个未来战争的形态，里面出现的唯一一个真实城市的样本，竟然是克拉科夫，作为在现实中离奥斯维辛最近的城市，这个矛盾点是非常吸引我的。我很想看看这个真实城市在押井守的电影里到底稀释了多少，留下了多少。而我也一直对二战历史也很感兴趣，正好当时在欧洲其他各地旅行，所以就来到了克拉科夫。

其实最开始没有计划要做作品，但去了之后很自然的觉得我应该做点儿什么。当时，脑子里只知道一个大概的线索，好多东西是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发生的。我特别相信巧合，而我的作品经常在探讨一个人和一个地点发生关联的可能性，这个可能性本来就应该是有许多巧合偶然性在其中，这是特别美妙的。

《麓客》：去过之后，你觉得押井守稀释了什么呢？

杨圆圆：我猜测这座城市在电影中的刻画是基于他自己的想象、和对克拉科夫只言片语的了解。我觉得他应该去过克拉科夫。我去航空博物馆的时候，也有好多联想，觉得也许他来过此地。但话说回来，我对克拉科夫能有多少了解，其实也只是基于旅行者的想象罢了。

《麓客》：书中所有旧照片是在克拉科夫找到的吗？

杨圆圆：全部素材都是在这个城市找到的，比如跳蚤市场。我收集老照片也有很长时间了。自从 2008 年去英国，第一次去跳蚤市场就开始收集，到现在已经有六年了。对老照片的兴趣其实是我对摄影史的兴趣，而胶片摄影的时代已经终结，我们对待照片的方式改变了，我们对待记忆的方式也改变了。在以前，照片不仅仅是图像，而是一个物件。你上战场，远离心爱的人，你会揣着她的照片，揣在项链里，揣在钱包里，揣在衣服兜儿里，照片是一个充满情感寄托的物件。但这样的情结现在已经不在了，胶片照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这是我对老照片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原因。

《麓客》：可以找到一个人 20 多年的照片（书中的 Teresa）真的很巧，这种情况多吗？

杨圆圆：像 Teresa 这样完整的一套照片还是看运气。我当时看到这套照片的心情是，哇，20 多张，是她的 20 多年！第一反应是在战后的波兰，你会看到一个这么美丽，充满自信的一个女性形象，当时就特别激动，这一摞我都要拿走。回去也没有仔细看，就以为这一摞都是她。后来发现其中有一张好像不对，仔细看背面才意识到，这一张的名字是 Marina Vlady，不是 Teresa。又去查，才知道我曾经看到过她。她是戈达尔 1967 年的作品《我略知她一二》的女演员。我在 2011 年就看过那部片子，还做了一系列摘抄。在那部电影里，戈达尔在试图说的东西，其实和我这本书试图说的东西平行交叉，只不过一个是在 1960 年代，一个在现在。这一切发生的都很偶然，而这整本书就是关于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这一切会发生怎样的联结。

《麓客》：Teresa 和 Marina 之后，紧跟着是这个在旅馆偶遇的女孩的照片。

杨圆圆：其实这些影像组合，包括收集 Teresa 的照片的行为本身，是我对摄影这个介质本身的思考。关于在旅馆偶遇的这个女孩，我们在现实中相遇的这一次，留下的这两个瞬间是我跟她唯一能相遇的一个方式。对 Teresa 来说也是一样，虽然这些照片不是我拍的，但是我获得了这 20 多张来自她过去 20 年生活的零散切片，虽然我完全不了解她。罗兰巴特在《明室》里谈到摄影与死亡的关联，被记录下来的这一秒在下一刻就已

经直接成为了胶片上过去，跟过去和将来没有联系。

《麓客》：而你曾提到，试图还原真实的照片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无效的。

杨圆圆：譬如这张照片，是奥斯威辛唯一没被炸毁的毒气室中，墙壁上的手印。照片下并没有在这里做特别的强调，而在上两页的黑色纸张上只有三行字，是对书的开篇（T. S. 艾略特）的诗句作出的回应——“什么是真实的，只真实于一次时间，只真实于一次地点。”我认为，任何图像都不可能重现在那个房间中的体验，摄影在这里是无效的，有效的只是在那一刻此情此景的体验本身。从另一种程度来说，印记本身在我看来也是一种非常“摄影”的存在。

就像这几张过去的铁轨留下的痕迹。虽然在书里没有强调那么多，但我一直对痕迹很感兴趣，痕迹和摄影的诞生是有关联的。我 2013 年做过一个行为装置作品 Tracing (Chasing) Shadows within the Present Past，作品的起始点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幅岩洞壁画，其中有个图像特别吸引我，那是几个人的手印。当时我就觉得，这是历史上最早的照片，因为它留下的是完完全全这些人的印记，手的大小就是他们的手掌的大小，创作者把他们曾经在此情此景的印记留了下来。

而摄影刚刚诞生的时候是没有摄像机的，是塔尔伯特（Talbot）试图给物的倒像留下一个印记，然后把它描绘下来。我在街上看到的一些印记，对我来说就非常地具有摄影感，它们没有通过照相机，而是在这里留下了一个物体曾经存在过的证明。

另外，我也不是特别在乎自己拍的照片，只是想借助照相机留下一个现实的切片，它好看或不好看，也许不是特别重要。我不断强调自己的工作方式就像是一个“编织者”，这些图像素材，无论是我拍的，还是我所收集的，在我进行编织的时候，它们都是平等的。

《麓客》：是否格外喜欢书这个媒介？

杨圆圆：我的作品呈现肯定会有多种形式，但是我希望每一次都会有一本书的存在。我特别喜欢书的原因有几点，首先它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形式。一件艺术品最后只能被三到五个藏家拥有，展览过后，它们也许只能被放在一些人家的储藏室。但书的价格是一般人都可以承受的。对我自己来说，通常能够对我产生影响的作品，都建立在需要反复观看的基础之上。可能你在第一遍看的时候，它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而是在之后不断重看的过程里，它逐渐地对你产生了一些影响。去看展览固然重要，但当你喜欢的艺术家在很远的地方，你看不了他的展览时，他如何对你产生影响呢？书不一样，它可以一直站在你家的书架上。

其次，书这个媒介特别自由，它可以是一张大纸，可以被折成各种形态，它可以是一种纸上展览，还可以是纸上电影。今后我也会多去尝试一些印刷品的可能性。

《麓客》：人们常说纸媒会死，你又怎么觉得？

杨圆圆：不会，它会只变得更稀有，但它不会消失。对一大部分小说来说，书只是作为一个承载文字的媒介，那么它们中的很多以后可能会以电子版的方式存在。但会有越来越多人去尝试印刷品的可能性。就像很多人说胶片摄影会死，其实也不会。这个东西只会变得不那么大众化，会让接触它的人思考更多。真正需要并享受它的人，会更加小心对待它。

《麓客》：以后的作品都会和城市空间有关吗？

杨圆圆：不一定，但这是一个我主要的兴趣点与观察点。其实可以说说我和北京的关系，我生在西城，长在海淀，16岁之前我一直在住校，从三岁住幼儿园，然后住小学，初中，高中终于转了走读学校，但没念完就去了英国。其实在出国前，我跟这个城市真正接触的机会是比较少的。我有一个正在进行的比较长期的作品，是关于这座城市的。总体来讲，城市有很多吸引我的原因，它是一个一直在变化中的整体，一个特别丰富的时态。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网络，《在克拉科夫的十日》像是提供了一种样本，这样的联结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中发生。

本文最初发表于《麓客》，2015年12月刊